

北大未名文丛

透过历史的烟尘

乐黛云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透过历史的烟尘/乐黛云著. -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11
(北大未名文丛)

ISBN 7-301-03531-4

透... 乐...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267

书 名: 透过历史的烟尘

著作责任者: 乐黛云

责任编辑: 张 冰

标准书号: ISBN 7-301-03531-4/ I·0448

出版者: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京大学校内 100871

电 话: 出版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559712 编辑部 62752032

排版者: 北京大学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

印刷者:

发行者: 北京大学出版社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6.5 印张 169 千字

1997 年 11 月第一版 1997 年 11 月第一次印刷

定 价: 12.00 元

序

季羨林

我认识黛云已将近半个世纪了。当时我们都还没有搬出城外,仍在沙滩红楼。她是一个 19、20 岁的大学生,我是一个还没有走出青年时期的年轻的大学教师。因为不在一个系,所以并没有接触的机会。她认识我,并不奇怪。因为教授的人数毕竟是极少的。我知道她,却颇有点不寻常。她为人坦诚率真,近乎天真;做事大刀阔斧,决不扭扭怩怩,决不搞小动作。有这样禀性的人,在解放后 30 年来的连绵不断的政治运动中而能够不被溅上一身污泥浊水、戴上五花八门的莫须有的帽子,简直是难以想像的。事实上,她也确实没有能幸免。这一点在本集的文章中也有所透露。

最近几年以来,我心中萌发了一个怪论: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年纪比较大一点的知识分子,在历次的政治运动中,被整,被污辱,被损害,是正常的。这证明,他们起码还是些好人。这样的人,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地,他们堂堂正正做人,用不着反躬自思。他们应该以被戴上的帽子为荣,他们可以以此自傲。反过来,如果有的知识分子,平安地走过了历次政治运动,没有被溅上任何的污泥浊水,没有被戴上任何莫须有的帽子,这样的人,我认为,反而应该反躬自省:自己在处世做人方面是否有什么不足之处。不然的话,为什么能够在那种黄钟为轻、蝉翼为重,颠倒黑白、混淆邪正的运动中安稳过关?我不敢说,我这个想法能适用于一切人;但适用于大部分人,则是可以肯定的。

黛云的前半生,走的道路并不平坦,坎坎坷坷,磕磕碰碰,一直走过了中年。然而,根据我个人的观察,她依然是坦诚率真,近乎天真;做事仍然是大刀阔斧,决不忸忸怩怩,决不搞小动作,锐气有盛于当年。就凭着这一股劲,她在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基础上拓宽了自己的研究范围,开阔了自己的眼光,为中国比较文学这一门既旧又新的学科的重建或者新建贡献了自己的力量。比较文学在中国原来是一门比较陌生的学问。最近几年来,由于许多学者的共同的努力,它已经浸假步入显学的领域。在这里,黛云实在是功不可泯。佛经常说:“功不唐捐。”黛云之功也不会“唐捐”。张皇比较文学,对中国文学的研究,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有了比较,多了视角,以前看不到的东西能看到了;以前想不到的问题能想到了,这必能促进中国文学的研究,是很显然的。黛云不但在中国国内推动了比较文学的研究,而且,更重要的是,她奔波欧美之间,让世界比较文学界能听到中国的声音。这一件事情的重要意义,无论如何也决不能低估。所有这一切,在本书中的许多文章中都有轨迹可寻,我就不再 FDEB 嗦了。

最值得一提的是,正如我在上面提到过的,黛云的前半生,屡遭磨难,透过历史的烟尘,她看到过极其令人愤懑的东西;然而她那一颗拳拳爱国之心丝毫未改。正当别人昼思梦想使自己在国外的居留证变成了绿色,对于这些人来说,太平洋彼岸就好像是佛经中常描述的宝渚,到处是精金美玉,到处开满了奇花异卉,简直是人间的乐园,天上福地。留在这样一个地方,对黛云和一介来说,唾手可得。然而他们却仍然选择了中国。在中国,本来她也有很多机会,弄上一顶乌纱帽,还可能是一顶令人艳羡不置的驻外的乌纱帽。请允许我在这里说几句只有书呆子才能说出的话:为中国增添一位女比较文学家,比增添一位女外交家意义更大,即使是从外交这个角度上来看,也是如此。然而她却偏偏又选择了北大,一领青衿,十年冷板凳,一呆就是一生。我觉得,在当前的中国,我们

所最需要的正是这一点精神,这一点骨气。我们中华民族所赖以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也正是这一点精神,这一点骨气。我们切不可等闲视之。

黛云集其近年来所写之散文为一集,索序于我。我虽谫陋,义不容辞。拉杂写来,遂成此文。这能算是序吗?我怀疑。但是序无定型,自古已然。就把它当成一篇序吧。

1997.5.22

我的选择 我的怀念

生活的道路有千百种可能,转化为现实的,却只是其中之一。转化的关键就是选择。

1948年,我同时考上了北大和后来迁往台湾的中央大学、中央政治大学,还有提供膳宿的北京师范大学。我选择了北大,只身从偏僻遥远的山城,来到烽烟滚滚的北方。其实,也不全是“只身”,在武汉,北京大学学生自治会委托从武汉大学物理系转入北大历史系的程贤策同志组织我们北上,他是我第一个接触到的,与我过去的山村伙伴全然不同的新人。他对未来充满自信,活泼开朗,出口就是笑话,以至得了“牛皮”的美称。在船上,他一有机会就有意无意地哼起:“解放区的天”,直到我们大家都听熟、学会。

尽管特务横行,北京大学仍是革命者的天下。我们在校园里可以肆无忌惮地高歌:“你是灯塔”,“兄弟们向太阳,向自由”,甚至还演唱“啊,延安……”,北大剧艺社,大地合唱团,舞蹈社,读书会全是革命者的摇篮。我很快就投入了党的地下工作。我和我的领导人(单线联系)常在深夜月光下借一支电筒的微光校对新出版的革命宣传品(我们新生居住的北大四院就在印刷厂所在地五院近邻,工人们常深夜偷印)。那些描写解放区新生活、论述革命知识分子道路的激昂文字常常使我激动得彻夜难眠。记得当时最令我感动的就是那本封面伪装成周作人的《秉烛夜谈》的《大江流日

夜——中国人民的血日夜在流》。很多年以后，我才知道这本激励过千百万青年人的名篇的作者原来就是北大党委宣传部长王孝庭同志！那时，我们还绘制过需要在围城炮击中注意保护的文物和外交住宅的方位略图，又到我的老师沈从文和废名先生家里访问，希望他们继续留在北京。值得骄傲的是尽管胡适把全家机票送到好几位教授手中，飞机就停在东单广场，然而北大却没有几个教授跟国民党走！

50年代初期，曾经有过那样辉煌的日子！到处是鲜花、阳光、青春、理想和自信！当解放后第一个五四青年节，我和另一位同学抱着鲜花跑上天安门城楼向检阅全市青年的少奇同志献上的时候，当民主广场燃起熊熊篝火全体学生狂热地欢歌起舞的时候，当年轻的钱正英同志带着治淮前线的风尘向全校同学畅谈她治理淮河的理想时，当纺织女工郝建秀第一次来北大讲述她改造纺织程序的雄心壮志时，当彭真市长半夜召见基层学生干部研究北大政治课如何改进，并请我们一起吃夜宵时，……我们只看到一片金色的未来。那时，胡启立同志曾是我们共青团的团委书记，我也在团委工作，他的温和、亲切，首先倾听别人意见的工作作风总是使我为自己的轻率暴躁深感愧疚……啊！多么令人怀恋！那纯净清澈、透明的、真正的同志关系！

我有幸作为北大学生代表，又代表全北京市学生参加了在布拉格召开的第二届世界学生代表大会。在横贯西伯利亚的火车上，我认识了北大的传奇人物，北大学生自治会主席，反饥饿、反迫害的急先锋，通缉黑名单上的首犯柯在铄同志。和他在一起，简直像生活在童话世界。黄昏时分，我们到达莫斯科。团长下令，不许单独行动，不得擅自离开我们下榻的国际饭店。然而就在当晚10点，老柯和我就偷偷下楼，溜进了就在附近的红场。我们哪里按捺得住？况且如老柯所说，两个人就不算“单独”，有秘书长还能说“擅自”？我们在红场上迅跑，一口气跑到列宁墓。我们在列宁墓

前屏住呼吸,说不出一句话,只感到灵魂的飞升!后来,我们当然挨了批评,但是心甘情愿。会议结束时,我曾被征询是否愿意留在布拉格,参加全国学联驻外办事处工作,当时办事处主任就是现任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吴学谦同志。我考虑再三,最后还是选择了北大。

后来……后来就是一连串痛苦而惶惑的岁月,谁也说不清是怎么回事。记得在北大“文化大革命”最狂热的日子,红卫兵突然宣布大叛徒、大特务程贤策自绝于党和人民,永远开除党籍。批判会一直开到天黑,回家路上,走到大饭厅前那座旗杆下面(现已移往西校门附近),一颗震骇而空虚的心实在无法再拖动沉重的双腿,我陡然瘫坐在旗杆的基石上!是的,这就是那座旗杆,1952年我们全体应届毕业生献给母校的纪念。当时人们还是如此罗曼谛克!他们要为母校献上这一座旗杆,以便北大从红楼迁到燕园时,新校园的第一面五星红旗将从这座旗杆上高高升起!我们又不愿用父母的钱,而要用每个同学第一次劳动所得的五角钱来完成这一“伟业”。留校的我担任了总征集人。那个夏天,我收到了许许多多五角钱的汇款单。尽管邮局同志老向我不耐烦地瞪眼,我还是在蒋荫恩总务长的支持下建成了这座旗杆!那时程贤策是文学院党支部书记,我还清楚地记得他曾笑眯眯地警告过我:“你这个口袋里有多少钱都数不清的人哪!可要记好帐,当心人告你贪污!”后来我在斋堂村被监督劳动时,程贤策作为中文系党总支书记曾到当地慰问下放干部,那时,横亘在我们之间的,已是“敌我界限”。白天,他看也没有看我一眼。夜晚,是一个月明之夜,我独自挑着水桶到井台打水,我当时一个人住在一个老贫农家,夜里就和老俩口睡在一个炕上。白天收工带一篮猪草,晚上回家挑满水缸已成了我的生活习惯。我把很长很长的井绳勾上水桶放进很深很深的水井,突然看见程贤策向我走来。他什么也没有讲,只有满脸的同情和忧郁。我沉默着打完两桶水。他看看前方好像是对井绳

说：“也难得这样的机会，可以这样长期深入地和老百姓在一起。”过一会儿，他又说：“党会理解一切！”迎着月光，我看见他湿润的眼睛。我挑起水桶，扭头就走，唯恐他看见我夺眶而出的热泪！我最后一次看见他，就是出事的前一天。我去买酱油，看见他买了一瓶很好的烈酒。我在心里默默为他祝福：“喝罢，如果酒能令你暂时忘记这不可理解的、屈辱的世界！”后来，人们说他就是这样一手拿着酒，一手拿着敌敌畏，走向香山深处！程贤策！难道他真就这样永远不再回来？作为一个大叛徒？一个大特务？我当时的心情惟能表现于中文系最优秀的学生女诗人林钊平反追悼会上的一副对联。17岁的林钊，她为坚持真理，被划为右派，又不肯“悔改”，在多年监禁后终于被枪毙！枪毙后，还向她母亲收取了七分子弹钱！这副对联没有字，上联是一个怵目惊心的大问号，下联是一个震撼灵魂的惊叹符！

程贤策就这样离开了这个他无法理解的动乱的世界。距此10年前，中文系解放后的第一个研究生，钟敬文教授最器重的弟子朱家玉早就因不愿忍受成为“右派”的屈辱，深夜自沉于渤海湾；我的老师，著名诗人，宽厚善良的废名先生双目失明于北国长春，传说因无人送饭而饿死于“文化大革命”……林钊、朱家玉、程贤策、废名……这些时刻萦绕于我心间的美丽之魂！他们都是北大抚育出来的优秀儿女，北大的精英！如果他们能活到今天……

20年就这样过去了。我们终于认识了自己，认识了世界。几年来，人们完成了过去几十年也未能完成的思想历程。我在北大当过猪倌、伙夫、赶驴人、打砖手，最后又回到学术岗位。我曾访问了美国、加拿大，还有欧洲。我确实有机会长期留在国外，然而，再一次，我选择了北大！我属于这个地方，这里有我的梦，我的青春，我的师友。在国外，我总是对这一切梦绕魂牵。我必须回到这里，正如自由的鱼儿总要回到赋予它生命的源头。我只能从这里再出发，再向前！

1948 - 1988,40 年北大生涯！生者和死者,光荣和卑劣,骄傲和耻辱,欢乐和喜,痛苦和泪,生命和血.....“四十而不惑”,40 年和北大朝夕相处,亲历了北大的沧海桑田,对于那曾经塑造我、育我成人,也塑造培育了千千万万北大儿女的“北大精神”,那宽广的、自由的、生生不息的深层质素,我参透了吗?领悟了吗?我不敢肯定,我唯一敢肯定的是在那生活转折的各个关头,纵然再活千遍万遍,我的选择还是只有一个——北大。

1988 .1

透过历史的烟尘

——纪念一位已逝的北大女性

人生在世,总有一些场景,铭刻于心,永远难忘,尽管时光如逝水,往事瞬间就会隐没于历史的烟尘;但这些场景像里程碑,联系着一些人和事,标志着你成熟的某个阶段,已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

你曾注意到未名湖幽僻的拱桥边,那几块发暗的青石吗?那就是我和她经常流连忘返的地方。1952年院系调整,我和她一起大学毕业,一起从沙滩红楼搬进燕园,她当了解放后中文系第一个研究生,我则因工作需要,选择了助教的职业。我们的生活又忙碌,又高兴,无忧无虑,仿佛前方永远处处是鲜花、芳草、绿茵。她住在未名湖畔,那间被称为“体斋”的方形阁楼里。我一有空,就常去找她,把她从书本里揪出来,或是坐在那些大青石上聊一会儿,或是沿着未名湖遛一圈。尤其难忘的是我们这两个南方人偏偏不愿放弃在冰上翱翔的乐趣,白天没空,又怕别人瞧见我们摔跤的窘态,只好相约晚上十一二点开完会(那时会很多)后,去学滑冰。这块大青石就是我们一起坐着换冰鞋的地方。我们互相扶持,蹒跚地走在冰上,既无教练、又无人保护,我们常常在朦胧的夜色中摔成一团,但我们哈哈大笑,仿佛青春、活力、无边无际的快乐从心中满溢而出,弥漫了整个夜空。

我是她的入党介绍人,她是上海资本家的女儿,入党时很费了一番周折。记得那是1951年春天,我们正在热火朝天地学习文件,准备开赴土地改革最前线。她的父亲却一连打来了十几封电报,要她立即回上海,说是已经联系好,有人带她和她姐姐一起经香港,去美国念书,美国银行里早已存够了供她们念书的钱。她好多天心神不宁,矛盾重重。我当然极力怂恿她不要去,美国再好,也是别人的家,而这里的一切都属于我们自己,祖国的山,祖国的水,我们自幼喜爱的一切,难道这些真的都不值得留恋么?况且当时在我心目中,美国真是一个罪恶的渊藪,美国兵强奸了北大女生,可以无罪开释,二战胜利前夕,我亲身体会了美帝国主义者在中国大后方的霸道横行!我们一起读马克思的书,讨论“剩余价值”学说,痛恨一切不义的剥削。她终于下定决心,稍嫌夸张地和父亲断绝了一切关系。后来,她的父亲由于愤怒和伤心,不久就离开了人世。在土改中,她表现极好,交了许多农民朋友,老大娘、小媳妇都非常喜欢她。土改结束,她就作为剥削阶级子女改造好的典型,被吸收入党。

农村真的为她打开了一片崭新的天地,她在土改中收集了很多民歌。每当人们埋怨汉族太受束缚,不像少数民族有那么多美丽的歌和舞,她就会大声反驳,有时还会一展她圆润的歌喉,唱一曲江南民谣:“沙土地呀跑白马,一跑跑到丈人家……风吹竹帘我看见了,鸭蛋脸儿,黑头发,红缎子鞋扎梅花,当田卖地要娶她。”她一心一意毕生献身于发掘中国伟大的民间文学宝藏。当时北大中文系没有指导这方面研究生的教授,她就拜北京师范大学的钟敬文先生为师。她学习非常勤奋,仅仅三年时间就做了几大箱卡片,发表了不少很有创见的论文。直到今天,仍然健在的钟敬文教授提起她来,还是十分称赞,有一次还曾为她不幸的遭遇而老泪潸然。

她的死对我来说,始终是一个谜。我们最后一次见面,就是在

这拱桥头的大青石边。那是 1957 年 6 月，课程已经结束，我正怀着第二个孩子，她第二天即将出发，渡海去大连，她一向是工会组织的这类旅游活动的积极参加者。她递给我一大包洗得干干净净的旧被里、旧被单，说是给孩子作尿布用的。她说她大概永远不会做母亲了。我知道她深深爱恋着我们系的党总支书记，一个爱说爱笑，老远就会听到他的笑声的共产党员。可惜他早已别有所恋，她只能把这份深情埋藏在心底并为此献出一生。这个秘密只有我一个人知道。当时，我猜她这样说，大概和往常一样，意思是除了他，再没有别人配让她成为母亲罢。我们把未来的孩子的未来的尿布铺在大青石上，舒舒服服地坐在一起，欣赏着波动的塔影和未名湖上夕阳的余辉。直到许许多多以后，我仍不能相信这原来就是她对我、对这片她特别钟爱的湖水，对周围这花木云天的最后的告别式，这是永远的诀别！

她一去大连就再也没有回来！在大连，她给我写过一封信，告诉我她的游踪，还说给我买了几粒非常美丽的贝质纽扣，还要带给我一罐美味的海螺。但是，她再也没回来！她究竟是怎么死的，谁也说不清楚。人们说，她登上从大连到天津的海船，全无半点异样。她和同行的朋友们一起吃晚饭，一起玩桥牌，直到入夜 11 点，各自安寝。然而，第二天早上却再也找不到她，她竟这样离开了这个世界，永远消失，无声无息，全无踪影！我在心中假设着各种可能，惟独不能相信她是投海自尽！她是这样爱生活，爱海，爱天上的圆月！她一定是独自去欣赏那深夜静寂中的绝对之美，于不知不觉中失足落水，走进了那死之绝对！她一定是无意中听到了什么秘密，被恶人谋杀以灭口；说不定是什么突然出现的潜水艇，将她劫持而去；说不定是有什么星外来客，将她化为一道电波，与宇宙永远冥合为一……

这时，“反右”浪潮已是如火如荼，人们竟给她下了“铁案如山”的结论：顽固右派，叛变革命，以死对抗，自绝于人民。根据就是在

几次有关民间文学的“鸣放”会上,她提出党不重视民间文学,以至有些民间艺人流离失所,有些民间作品湮没失传;她又提出五四时期北大是研究民间文学的重镇,北大主办的《歌谣周刊》成绩斐然,如今北大中文系却不重视这一学科。不久,我也被定名为“极右分子”,我的罪状之一就是给我的这位密友通风报信,向她透露了她无法逃脱的,等待着她的右派命运,以至她“畏罪自杀”,因此我负有“血债”。还有人揭发她在大连时曾给我写过一封信(就是谈到美丽钮扣和美味海螺的那封),领导“勒令”我立即交出这封信,不幸我却保留信件的习惯,我越是忧心如焚,这封信就越是找不出来,信越是交不出来,人们就越是怀疑这里必有见不得人的诡计!尽管时过境迁,转瞬 37 年已经过去,然而如今蓦然回首,我还能体味到当时那股焦灼和冷气之彻骨!

1981 年,我在美国哈佛大学进修,普林斯顿大学的一个朋友突然带来口信,说普林斯顿某公司经理急于见我一面,第二天就会有车到我住处来接。汽车穿过茂密的林荫道,驶入一家幽雅的庭院,一位衣着入时的中年女性迎面走出来,我惊呆了!分明就是我那早在海底长眠的女友!然而不是,这是 1951 年遵从父命,取道香港,用资本家的钱到美国求学的女友的长姊。她泪流满面,不厌其详地向我询问有关妹妹生活的每一个细节。我能说些什么呢?承认我劝她妹妹留在祖国劝错了吗?诉说生活对这位早夭的年轻共产党员的不公吗?我甚至说不清楚她究竟如何死,为什么而死!我只能告诉她我的女友如何爱山,爱海,爱海上的明月,爱那首咏叹“沧海月明珠有泪”的美丽的诗!如今,她自己已化为一颗明珠,浮游于沧海月明之间,和明月沧海同归于永恒。

一个冷隽的人 一个热忱的人

——纪念吾师王瑶

入昭琛师门下，倏忽已是 38 载！记得 1952 年一个万物繁茂滋生的夏夜，第一次往谒先生，谈及我从先生学现代文学史的意愿。先生说：“现代史是非常困难的，有些事还没有定论，有些貌似定论，却还没有经过历史的检验！”他点燃了烟斗，冷然一笑，“况且有时还会有人打上门来，说你对他的评价如何如何不公，他是如何如何伟大等等，你必须随时警惕不要迁就强者，不要只顾息事宁人！”他掷过来锐利考察的一瞥。“何不去学古典文学呢？至少作者不会从坟墓里爬出来和你论争！”我说，“那么，先生何以从驾轻就熟的中古文学研究转而治现代文学史呢？”我们相视一笑，一切尽在不言中，他收了我这个学生。

在那个生意盎然，相互感应着雄心壮志的夏夜，我们何曾想到历史竟会是这样发展？20 年一片空白，我唯一能记起的是 1957 年 4 月，我和一些朋友被那活跃的“早春天气”弄得昏头昏脑，异想天开，竟想靠募捐来办一个中级学术刊物，让不大成熟的年轻人的文章也有地方发表。没想到先生严辞拒绝了我的募捐要求，他从来是一个十分冷峻的时事分析家。按照他分析的结果，他严厉警告我，绝对不要搞什么“组织”，出什么“同人刊物”，必须对当时的鸣放热潮保持头脑清醒。当时还只是 4 月末。我们听从了他的劝

告,但为时已晚,他的真知灼见和料事如神终于未能救出他的三个学生。

之后,我就没有机会接近先生。“文化大革命”中,他的遭遇比我更悲惨。我永远也不能忘记那难于回首的一幕:由于有人挟嫌诬陷,他被一群红卫兵打得鲜血淋漓。我们这些“专政对象”和全体革命群众都被勒令到现场“接受教育”。带铜扣的皮带和鞭子落在他的头上和身上,鲜血沿着苍白的脸颊流下来。打手们逼迫他承认:是他,蓄意侮辱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将一张印有毛主席像的报纸扔到厕所里。先生忍受着,报以绝对的沉默。那高傲心灵的扭曲和伤痛真是伤心惨目!我的心在哭泣!

终于雨过天晴,有人来调查他所受的迫害,要他指出曾经伤害他的人。先生一笑置之,说是全都不记得了。其实,哪里能忘记呢?先生一向以博闻强记著称,所有往事都会历历在目。例如,有一次,先生和我谈起当时被囚禁在“牛棚”中的生活,十分感慨于像朱光潜先生那样一向严肃的学者,也会在“牛棚”那样的特殊环境下写出一首非常可笑的打油诗。先生一字不漏地将这首诗背给我听,并告诉我当时“牛棚”并无纸笔,朱光潜先生是把这首诗念给他们两三个人听的。那时生活虽然艰辛,他们听了这首诗,还是忍不住笑了一场,看守极为恼怒,勒令他们几个人把诗句背出来。先生一个字也不肯说,只说朱光潜先生根本就没有做什么诗。为此,他遭受了一顿毒打。先生解嘲地说:“我在牛棚挨打,多半是为了劳动跟不上趟,那时真心后悔儿时在农村未曾好好锻炼。惟独这一次挨打,是为了朋友!”

10年改革开放,先生学术著作硕果累累,也曾有过宏伟的学术研究规划。他是大海,能容下一切现代的、传统的,新派的、旧派的,开阔的、严谨的、大刀阔斧的和拘泥执著的。在为我的一本小书写的序言中,他特别提出:“每个人如果能根据自己的精神素质和知识结构、思维特点和美学爱好等因素来选择结合自己特点的

研究对象、角度和方法，那就能够比较充分地发挥自己的才智，从而获得更好的成就。”这些话一直给我力量和信心，催我前进。

先生的音容笑貌，他那幽默的谈吐，富于穿透力的锋利的眼神，他那出自内心却总带几分反讽意味的笑声，他那冷隽的外表下深藏着的赤子的热忱……38年来，这一切对我是如此亲切，如此熟悉！难道这一切都永远消逝，只留下一撮无言的灰烬？

记得最后一次去先生家，已是深秋季节，古老的庭院，树叶在一片片飘落，那两头冰冷的大石狮子严严把守着先生的家门，更增添了气氛的悲凉和压抑。我东拉西扯，想分散先生的注意，和他谈些轶闻琐事，但先生始终忧郁，我也越谈越不是滋味，终于两人相对潸然。先生说有一桩事，一点心愿，也许再也难以实现……

最后一面见先生，是在苏州的寒山寺。先生原已抱病，却执意要参加他担任了10年会长的中国现代文学学会的苏州理事会。会议在风和日丽中圆满结束，先生作了总结，告别了大家，安排了明年年会。没想到最后一天游览，寒流猛至，北风凛冽，先生所带衣物不多，却坚持要上寒山古寺，一登那古今闻名的钟楼。“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先生花了三块钱，换来古钟三击。钟声悠扬凄厉，余音袅袅，久久不息。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心在寒风中颤栗，总觉得听出了一点什么不祥之音！先生击钟，在呼唤谁？在思念谁？在为谁祝愿？在为谁祈福？这钟声，为谁而鸣？而今，年末岁暮，心衰力竭，我哭先生，欲哭无泪，我呼先生，欲语无言！惟愿先生英灵，随袅袅钟声乘姑苏客船，驶向那极乐的永恒！